

江明为陈麟德著“玩易轩文稿”(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所作序

客岁金秋时节,我应母校—江苏省扬州中学之邀,自沪返扬参加110周年校庆盛典。礼成,于翌日赴兴化,看望麟德学兄。事后,他以《桃花潭水深千尺》为题,撰文记其盛,发表在《泰州日报》与《扬州史志》上。麟德兄是我抗战胜利后在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梅花书院)读四年级时的同学。阔别六十六载,昔日顽童,如今均已成面苍然、发皤然、视茫然的老者。往事如烟,历历在目,回首前尘,恍若隔世矣!回想我历小学、中学至大学,乃至出国留学,再经历教育研究数十载,同窗同事者多不胜数,为何情之独钟于既非学术同行且在儿时仅有一年同学经历的陈麟德兄?个中缘由,值得玩味。

当年我与麟德兄同班同桌同嬉戏,竹马青梅,其情纯真无邪,十分珍贵。然儿时别后,咫尺天涯,此后仅偶有短暂联系。十年浩劫中我俩都罹劫难,更是音讯全无,幼时的这点情谊本早为时光消磨殆尽。不料,陈兄于改革开放之初便煞费苦心,来到扬州,通过多方打听先父轸光先生,终于联系上舍妹,得到我在上海的电话和地址,联系得以恢复。陈兄如此真情,令我十分感动。从此,书札频频,“数重云外树,不隔眼中人”。

陈兄出身于兴化名门望族,世代簪缨。数十载于极左路线之下迭

遭迫害，祸几不测，虎口余生。然而他却处之泰然，毫不气馁，潜心学术研究。近三十年中，不断有文章见诸报端，他常常复印寄我。惜乎我对文史知之不多，读来虽钦佩不已，但不克与他研讨琢磨。我曾对他许愿，在退休之后，如蒙不弃，愿从之游，研修汉学，背唐诗，诵宋词，怡情悦性，颐养天年。然如此期盼，因科研和教务始终不克分身，未能如愿。

麟德兄一生坎坷，一辈子囿于苏北小城，其图书资料匮乏自不待言。他潜心研究《明史》四十年，买不起书，就借阅摘录，甚至把人物传记全部抄下来。资料匮乏，他竭尽所能觅之，读之、研之、保藏之，遇到罕见版本则借来抄录，如李清撰《三垣笔记》、《南渡录》，他就抄了好几种版本。难得外出旅游之际，抄录和研读碑文楹联更成了他的必修功课。他求学之勤，求知之切，殆非常人所能及也。这本《玩易轩文稿》，乃其数十年如一日呕心沥血的成果，倘在著名高等学府或社科研究院所，或不足为奇；可对于麟德兄来说，得之步步艰难，故在我心中堪称是字字千钧。过去廿多年中，听麟德兄讲述他求学治学之艰辛，我内心共鸣强烈。文革之初我被打成“反动教员”，遭连续批斗。然我对学问追求之信念，始终没有泯灭，我曾购得英文版《毛泽东语录》，“打着红旗学英语”，不貲人口实。即使在受批判之时日，前途茫茫，但我研读本

学科经典也未中断，从中得到心灵慰藉。因此，论处境，论精神，我与麟德兄内心是完全相通的。这乃是我们儿时那份短暂同窗之情得以延绵至今的真谛。

我们恢复联系后，他常对我说起，在学术研究中，虽潜心经史，青灯夜读，皓首穷经，然时有疑惑，通查工具书参考书而不得其解，实苦于无人请益云云。说者无心，听者有意。90年代后，我与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卞孝萱先生同为民建中委，多次一起在北京开会。我素知卞老学养甚深，应可为陈兄解惑释疑，于是我便将他介绍给卞老，卞在复麟德信中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师事万不敢当，愿为好友，万勿客气”。自90年代初至2010年卞老仙逝，陈兄多次请益，卞老诲人不倦。陈兄有些论文的观点与结论，就是与卞老反复琢磨后敲定的。特别是2001年秋，卞老应邀去兴化参加第五届郑板桥艺术节，陈兄与之畅谈久之，卞老首肯陈兄的以笔记专著、野史、方志校勘《明史》的尝试。卞老和麟德兄结为文友，成忘年之交。这也算得上我为老友之学术研究做出的微小贡献，欣慰之至！

兴化之行，在陈兄的陪同下，瞻仰了“扬州八怪”佼佼者郑板桥纪念馆和故居，对“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板桥更为敬仰。又瞻仰兴化陈氏五进士府，从五进士在立德、立功、立言上的建

树，想到陈兄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因而毕生痴迷文史，百折不挠，老而弥坚。如今成果丰硕，当是顺理成章之事。

麟德学兄现将多年发表的文章，汇集出版，延我撰序。按交往之久，论友情之笃，却之实为不恭。但我是从事化学科学研究的，对文史知之甚少，不敢也不能赞一词。文稿褒贬抑扬，自有方家品说，我只是对麟德学兄的身世及多年交往作如是说，一倾肺腑之言，是为序！



江明于复旦纳雅斋

2013. 11. 30